



Public Opinion of
the New York Times Towards China
Discourse Perspective

《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 ——话语分析视角

刘立华/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013031917

G219.712
30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校级重点学科建设专项资金资助出版

《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 ——话语分析视角

刘立华/著



G219.712
30



北航

01639335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话语分析视角 / 刘立华著.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108-1838-7

I. ①纽… II. ①刘… III. ①《纽约时报》—舆论—美国对外政策—对华政策—研究 IV. ①G219.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84028号

《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话语分析视角

作 者 刘立华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32开

印 张 6.375

字 数 150千字

版 次 201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1838-7

定 价 26.00元

前言

国家形象传播一直是跨文化传播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该项研究以《纽约时报》对华舆论报道为个案，旨在从话语分析的角度探讨该报纸对华的形象建构问题。该书共分十五章，每章的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为引言，主要交代研究背景、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第二到第四章主要论述话语分析的一些理论和方法，主要涉及建构主义视角下的话语分析、批评话语分析和批评现实主义视角下的话语分析。话语分析的以上三种视角在强调话语和社会语境辩证实现关系的同时，又强调话语的建构功能和能动特征。话语不再是单纯的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带有一定目的和意图的社会建构力量。作为一种新闻话语的《纽约时报》也必定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建构。媒介话语在现实社会中所充当的也不再仅仅是镜子功能，即单纯传递某一信息，而是在建构一种社会事实或是社会知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媒介话语总是徘徊在反映和建构之间。话语的建构特征预设了话语背后的目的性和其意识形态特征，话语的建构总是按照一定的利益诉求，在一定规则和文化制度的制约下行使着自己的塑造功能。因此，所谓西方媒体的客观性只是他们希冀“现实建构或重塑”的一

种手段。

该书第五章是文献综述部分，主要回顾了媒介话语的范式流转以及社论研究的一些传统和特征。接下来的第六章和第七章主要讨论了在经济能源领域以及政治领域《纽约时报》的对华舆论特征。研究发现，在有关经济话题的社论中，《纽约时报》提倡一种合作和对话，并积极倡导美国的领导作用。社论在呈现不同观点时力求一种中立的立场，这种中立的立场表现在对国际利益的诉求和对中美双方的建议和指责。但是，在《纽约时报》倡导合作，并试图保持中立的话语传播体系中，中国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化的客体出现，中国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凸显。在有关中国政治话题的社论中，中国的国家形象完全不同于经济领域的特点，不再是《纽约时报》眼中的“小弟弟”，而是一个需要彻底改变的“异教徒”。第八章和第九章则以《纽约时报》刊发的有关中国故事为切入点，着重论述了该报纸在讲述中国故事时的话语策略，并以此案例论说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的基本范式特征。从第十章到第十四章，该书主要探讨这种负面报道的社会认知以及历史文化原因。第十章以 van Dijk 的语境模式为框架，讨论了《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社会认知功能；第十一章以《纽约时报》对拉萨“3·14”事件的两篇社论为蓝本，来探讨《纽约时报》在宏观语言学层面和微观语言学层面的呈现特点，然后透过这一现象来讨论《纽约时报》对华负面报道背后的一些历史文化动因；第十二章则以西方历史宗教为主线，对这种负面或是夸张的报道模式进行了剖析；第十三和第十四章则通过对《纽约时报》驻京记者和沙学文先生的采访，试图从西方记者和知名人士的角度来解读当下的西方报道模式以及中国应该采取的对策。第十五章和第十六章是该书的落脚点，其中第十五章涉及该书的一点学科思考，即能否把话语分析和新闻传播这两个起源于不同研究范式

的路径结合起来，取长补短、共同发展。第十六章则试图在总结《纽约时报》对华舆论传播策略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可借鉴的对外传播策略。

跨文化传播学界著名学者贾文山博士曾经指出，中西文化对“言说（speaking）”和“沉默（silence）”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动因，西方的传教士传统注定了西方文化对“说”和“宣传”的重视；而中国文化则更侧重“少说”和“关系”。在跨文化视野和话语修辞的视角下，在这样一种中西文化的分野下，西方记者总是试图去“发现”思想，总是试图以某种隐含的方式“邀请”一种反应或是试图去让受众对某一报道感到震惊。因此，他们总是使用一些在中国人看来是“夸张”的报道方式来表达一种尽可能强烈的观点以期能够得到一种回应。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在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喜好呈现详尽的细节，并借用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表达观点，进而努力拉近与潜在受众之间的距离，增强新闻故事的可读性和互动性。然而，中国文化中对公共言说和辩论的相对漠视必然导致对受众以及观点呈现方式研究的不足，官方话语中与受众的“互动”特征也没有较好体现，其传播模式还是单维度的，即过分考虑了话语作者的表达立场和方式，对受众考虑不够。同时，中国的新闻话语总是中规中矩，表现得小心翼翼，不敢越雷池半步，话语的表达策略总是像在“按事先设定好的套路表演武术”，而面对西方套路并不复杂的“拳击”时，则有时显得力不从心。

限于作者水平，本书中的某些观点一定有不当或是不妥之处，敬请各位学界前辈和同仁批评指正，不吝赐教！

刘立华

2011年2月于惠园

目 录

-
- 第一章 引 言 /001
- 第二章 理论基础(1): 话语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 /009
- 第三章 理论基础(2): 批评话语分析 /019
- 第四章 理论基础(3): 话语分析的批评现实主义视角 /034
- 第五章 相关文献综述 /041
- 第六章 《纽约时报》对华社论对话性策略研究: 以经济能源
话题为例 /053
- 第七章 社论话语中的中国政治形象 /070
- 第八章 《纽约时报》的中国故事(一) /080
- 第九章 《纽约时报》的中国故事(二) /092
- 第十章 《纽约时报》对华报道的语境阐释: van Dijk 的社
会认知模式 /099
- 第十一章 《纽约时报》有关拉萨“3·14”事件社论研究 /112
- 第十二章 西方媒体中的争论传统和夸张 /131
- 第十三章 外媒记者报道中国范式研究: 对《纽约时报》驻京
记者的采访 /137
- 第十四章 可能的对策: 对沙学文先生的专访 /141
- 第十五章 传播学研究的话语分析视野 /151
- 第十六章 结论: 自信与沟通 /166

参考文献 /173

后 记 /192

第一章 引言

1. 研究背景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特征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福特式的批量生产逐渐被具有灵活特征的经济体制和制度所取代，全球范围内政治新自由主义逐渐抬头，以文化转型或是转变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被一些理论学家看作是以上经济、政治变迁的具体表现。在此基础上的后现代主义视角下的话语研究侧重那些从特定地理位置分离出来而又穿越不同时空的符号意义的流转过程，现实也因此被这些不断旅行的符号所构成的幻觉（simulacra）所取代，现实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符号建构的产物。这种由符号或是意义流转所产生的“表述”（presentation）构成了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相互误解的根源。以某种意义模式存在为前提的不同国家和文化对意义的争夺又加剧了这一误解，作为意义栖息最重要载体的媒体话语也因此变成了是各种利益争斗的战场。因此，在一种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下，所有的文本形式，所有的话语实践形式无一不是社会的、历史的建构，是各种社会资源的再生产和配置过程，是各种意识形态、利益、欲望的重新编码和斗争。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但是,出于宗教、文化、价值观、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误会和敌视等原因,同时又加上信息传播机制的不同,西方媒体对中国事件的报道往往是负面的,在政治领域尤甚,甚至有学者提出西方主流媒体在“妖魔化”中国。毋庸置疑,当中国一些公共危机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些西方媒体往往对此进行片面、夸张的报道,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中西方却似处在不同的频道上,交流与沟通的方式和渠道虽然越来越多样化,但是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交流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当前,西方对中国的误读或是认知煎熬着每一个中国人,正如李远江等人^[1]指出的那样:

鸦片战争后,中国一而再,再而三的战败,使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渐渐丧失了信心。中国人也在一次次民族危机中一步一步接受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于是,一场从器物到政治,由政治到文化的现代化运动(实则西化)前仆后继持续了一百多年。时至今日,国力重新强大起来的中国依然未能恢复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学习西方仍然是煎熬整个民族的心理共识。

在这样一种文化大背景下,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西方媒体对我们的表述和“身份建构”,这种审视不应再停留在西方“对”与“错”的简单价值判断上,而应从深处挖掘西方媒体的话语修辞模式以及其历史文化动因。简单说来,西方媒体对

[1] 《国家先锋历史》,2009 年第 7 期。

中国的政治体制多有指责和负面报道^[1]，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西方媒体的有关中国的故事讲述无非是一种话语意义资源争夺的手段，是一种对“他者”历史性的习惯性建构。基于以上背景和社会认知，本研究以《纽约时报》对华社论和新闻报道为具体的文本研究对象，从话语分析的视角来解读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故事，探讨西方媒体的话语修辞的历史文化动因，以及由此所产生的话语修辞模式，以期对中国的对外宣传和国家形象传播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本研究是对自己前期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在前期研究中，作者选取《中国日报》2004—2005两年中所发表的社论为研究对象，以语言学中态度研究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范式为基础，采取体裁研究视角对《中国日报》社论的社会建构功能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1）提出了社论话语的分析模式；（2）丰富了我国在对外宣传方面的研究；（3）该研究没有局限于对社论本身语言特征的描述，而是把研究根植于系统功能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和体裁研究的视角之下，充分论述了作为一种体裁的社论的社会属性。但是，该研究的局限性在于没有能够从跨文化的角度去解读《中国日报》社论的修辞效果，只是侧重了社论体裁的语言修辞特征；同时，该研究只是对《中国日报》社论的研究，对其他国外重要的媒体的社论没有比较。为了丰富和拓展该项研究，本研究拟采取跨学科、跨文化视角，借鉴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批

[1] 西方媒体对中国的负面报道主要集中在政治领域，对中国的文化、经济报道则相对友好合作，但是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西方媒体眼中的中国只是一个被动的客体，是一个需要调教的他者，参见：刘立华，《纽约时报》对华社论中的对话性策略研究：以经济能源话题为例，《商务外语研究》2011（3）：11-18。

评) 话语分析理论研究范式, 从社会建构主义的视角, 对《纽约时报》近十年来的有关中国话题的社论、新闻进行研究, 以期发现《纽约时报》新闻话语在建构中国国家形象时所采取的话语策略及其背后的话语运作机制和历史文化动因。

2. 研究意义

近年来, 在话语分析领域, 媒介话语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Fowler *et al.* 1979; Hartley 1982; van Dijk 1987, 1988a, 1988b, 1991; Fowler 1991; Fairclough 1995, 1998; Bell and Garrett 1998; White 1998; Albakry 2005; Martin and White 2005; 辛斌 2000; 辛红 2000; 刘承宇 2002; 范红 2002; 曾庆香 2005; 胡春阳 2007; 赵为学 200; 刘立华 2011)。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话语形式, 报纸的社论话语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 (Fowler 1991; van Dijk 1992; Bolívar 1994; Westin 2002; Morley 2004 等)。媒介话语的研究大体从两个方向进行了延展。一是媒介话语的理论发展, 主要表现在语言学理论和话语理论在新闻文本研究的应用, 其二是横向的拓展。随着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各种思潮和学派的建立和发展, 人们对新闻的研究也不断深入。就社论研究而言, 我国新闻学术界也出版了大批与社论有关的新闻评论学的专著或文章 (例如秦圭、胡文龙 1987; 吴庚振 2001; 薛中军 2003 等)。

评论是媒介传播的重要文体, 是“媒体编辑部或作者对最新发生的有价值的新闻事件和有普遍意义的紧迫问题发议论、讲道理, 有着鲜明针对性和引导性的一种新闻文体, 是现代新闻传播工具经常采用的社论、评论、评论员文章、短评、编者按、专栏评论和述评的总称, 属于论说文范畴” (丁发章 2002: 15)。在所有评论体裁中, 社论占有重要地位。它是报纸的灵

魂和旗帜，是新闻评论中最重要的体裁，它代表编辑部（党报代表同级党委）就当前重大事件、事变或问题发表的权威性评论。社论和其他类型的话语一样，也是一种对社会的建构过程。社论在建构现实世界的过程中，社论作者在评价新闻事务和事件的过程中，通过传递一种观点和立场来引导社会舆论、影响公众行为。媒介话语的重要意义体现在以下两个例子中。

1943年7月，国民党趁共产国际解散之际，对解放区发起进攻，目的在于彻底摧毁陕甘宁革命政权。党中央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的同时，毛泽东写了一篇社论《质问国民党》，发表在1943年7月12日的《解放日报》上，该社论揭露了国民党的险恶意图，也引起了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迫于压力，国民党命令胡宗南撤兵，并声称这是一个错误。第二个例子是，1936年12月12日中国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时任《大公报》主编的张季鸾连续写就四篇社论^[1]，其中文章《致西安军界的一封信》被加印40万份空投到西安。在该文中，张季鸾深刻地分析了时局、指出了和平解决该事件的重要意义，该文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为一血泪之作。虽然张季鸾当时与蒋介石私交甚好，无可否认的是张的文章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的作用（胡文龙2002：181）。

该项研究整合社会语言学、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学学科，对所涉及学科的研究范式和学科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同时该研究与我国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社会话语实践密切相关，从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该项研究的实践意义和应用前景。该项研究的创新和发展在于：（1）研究范式的跨学科性：本研究没

[1] 这四篇社论分别是：《西安事变之善后》（12月14日）、《再论西安事件》（12月16）、《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12月18日）和《国民良知的伟大胜利》（12月20日）。

有局限于对社论话语本身语言特征的描述，而是根植于新闻传播学、批评话语分析、社会学等学科领域，从跨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来探讨社论体裁语言所承载的社会群体建构功能；（2）研究内容的实用性：该项研究主要关注《纽约时报》对我国的评论和新闻报道，与我国的社会实践密切相关；（3）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该项研究试图结合定性和定量研究，从描述和阐释两个阶段来具体探讨新闻话语的社会建构功能，争取做到描述充分，阐释深入。

3. 语料收集与研究方法

该项研究的语料组成包括两个部分：（1）国外主流媒体《纽约时报》所刊登的2001年1月1日到2008年12月31日的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2）有关中国的新闻报道。我们以“中国”（China）为关键词，日期限定为2001年1月1日至2008年12月31日，在《纽约时报》社论栏目中共得到社论488篇。我们选定的语料只涉及社论（editorial），对于“editorial notebook”和“editorial observer”两类评论性文体不做统计。在所有《纽约时报》发表的涉及中国的社论中，有些是直接以中国问题为内容，例如2007年3月15日发表的社论：“中国类型的议会”，我们把这类社论称为：直接评论中国部分。而有些则是提及中国，例如在朝核问题、伊朗核问题、苏丹问题等国际问题时都提到中国，在以上类型的社论中，《纽约时报》虽然不是直接评论中国，但是对中国的提及也反映了一定的态度或是立场，我们把此类社论归为：提及中国部分。在本项研究中我们只侧重直接评论中国的社论，提及中国的社论只是我们研究语料的补充。下图是社论的年份分布：

图一：《纽约时报》有关中国话题社论年份分布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评论中国 论坛	20	8	18	11	18	18	20	17

为了更好地观察《纽约时报》对中国形象的建构，作者还同时选取了两个突发事件作为观测点：西藏暴乱和新疆事件。通过观察《纽约时报》对以上两个事件的报道，来具体考察《纽约时报》是如何讲述中国故事的。

4. 研究目的

本研究致力于从话语的角度来观察《纽约时报》是如何建构了中国的形象。孙有中（2009）以《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在 1999—2002 年对中国的报道为语料进行了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深刻论述了两报所揭示的中国形象，并运用新闻学原理对它们在中国报道上存在的共性和差异以及其深层次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探讨了中国的国际形象现状与战略定位。在其专著《解码中国形象》中，作者指出，2003 年以来，中国形象研究俨然已经成为了国内学术界的显学，并详尽列举了国内有关这一课题的著作。

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在其他学科领域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在语言学领域，学者起先关注的是语言的句法结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随着一些边缘学科的兴起，人们越来越注意到社会文化因素在语言研究中的作用。一些学者也不再满足于句子层面的语言分析，而开始关注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关注某种话语实践背后的文化历史因素。这一研究的转向称之为语言研究的话语转向。许多话语研究者也开始从国家层面关注话语分析与传播学的结合，例如 van Dijk 的《作为话语的新闻》，

Fairclough 的《话语与社会变迁》以及国内外的一些文章、专著、译著、硕博士论文等。在方法论层面，也有国内学者对这种结合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例如胡春阳的《话语分析：传播研究的新路径》以及谢晖的《新闻文本学》等。

第二章 理论基础（1）：话语分析的建构主义视角

1. 引言

话语分析是一门发展很快的学科，话语意义的宽泛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话语分析这一研究领域范围的不断扩大。Mills（2003）曾经从语言学、心理学和文化研究的角度，以福柯著作中所涉及的话语理论为基础提出了三种类型的话语分析。第一类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该学派强调语言在语境中的使用，关注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代表人物主要来自伯明翰大学，例如 Coulthard 等人。第二类是社会心理学派，代表人物有 Potter、Wetherell、Kitzinger 和 Wilkinson 等。他们在注重话语分析研究方法的同时，也吸收人种志学和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重点关注会话和辩论的结构（Wetherell & Potter 1992; Wilkinson & Kitzinger 1995）。该话语分析学派在关注大于句子单位的语言单位的同时也关注后结构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例如权力关系和知识的产生等。这一理念体现在 Wetherell 和 Potter 的著作中：“后结构主义者没有做的是考察日常的话语——人们的会谈和辩论，也没有考察那些记录各种互动的材料，所以我们的目标是借助社会心理学的分析热情来寻求后结构主义所关注的一些问题，同

时也关注人种志学家和会话分析学家所探索的问题(Wetherell & Potter 1992: 89)”。Mills所区分的第三类的话语分析是批评话语分析,代表人物有Fairclough、Wodak、Trew、Kress、Thornborrow、Fowler、Threadgold。批评话语分析也是以超句子的单位为分析对象,但是往往受福柯的话语理论或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学的影响。在Mills看来,批评话语分析学派与社会心理学派的不同之处在于方法论的不同,前者更多的是一种语言学的分析,往往是在话语中寻找一种特定的语言条目或是句法结构的系统选择,而不是寻求一种新闻传播学意义上的内容分析或是主题分析。以上对话语分析的划分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语言学基础上的话语分析、(社会)心理学意义上的话语分析以及批评话语分析。以上话语分析的名称不同,但是却存在相似的地方,只是关注点和目的不同,同时以上三个话语分析派别的主要差异在于对“话语”的不同阐释。

2. 社会建构主义的主要内涵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在英国和北美的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其中包括批评心理学、话语心理学、话语分析、解构和后结构主义等。以上各研究流派共同点是社会建构主义(Burr 2003: 1)。社会建构主义起先是心理学的一个术语。然而,社会建构主义的一些基本的假设与其临近的社会学科关系密切。社会建构主义的基本假设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参见Burr 2003)。

对于知识的来源这一问题,社会建构主义和实证主义有不同的回答。实证主义者认为,世界的本质可以通过观察来揭示,而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人类理解世界的范畴并没有必要直接指向一种现实的区分,我们应该对想当然知识采取一种批判